

从傻瓜到恺撒



张心阳杂文自选集

张心阳 著

三

从傻瓜到恺撒

张心阳杂文自选集

张心阳／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傻瓜到恺撒：张心阳杂文自选集 / 张心阳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55-1015-6

I. ①从… II. ①张…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512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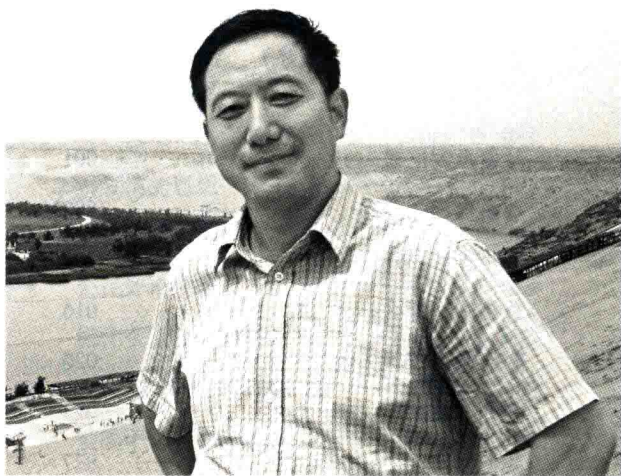
从傻瓜到恺撒

作 者	张心阳
主 编	朱铁志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柯 湘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15-6
定 价	49.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 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577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张心阳，《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大校军衔，北京杂文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1979年参加南疆自卫还击作战，出生入死于烽火硝烟中，三次荣立三等功。著有《带毒的亲吻》《站着说话也腰痛》等多部杂文随笔集。作品主要发表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随笔》《杂文月刊》等媒体，并入选《中国当代杂文经典》《中国百年杂文精华》《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等图书，数十篇文章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等全国性奖项。本世纪以来发表关于苏联问题的杂文随笔曾在中国文坛激起涟漪。

張心陽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

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

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前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入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

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

“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

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杂文也是主旋律（代序）

张心阳

曾有人问，你是一名军人，同时又是杂文家，两个身份不那么好兼顾，可不可以分享一些不曾为人知或不曾与人言的经历？

这让我想到钱钟书的故事。有人读了钱先生的小说，提出要见见他。钱先生说：“吃到鸡蛋就行了，何必还要见鸡。”当然，我没他那般高深，说一点“革命家史”是无妨的。

当初我没有想过要跻身行伍，只是高中毕业后在家乡当代课教师当得很无奈，才想到要远走高飞。这一选择也正合家父心意，他教导我们兄弟的“名言”是：“有本事，你们就滚得远远的。”我这一滚就滚到了南疆战场。1979年初在烽火硝烟、枪林弹雨的对越作战中奔突了近一个月。仗打完了也不回家，想着总得干成点事才回去。于是在尽首长警卫员之职之余就写文章。其实我这人很笨——和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差不多——刚开始写了几十篇稿都见不了报。中国人很善辩，对于这种现象往往给以好听的解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写到后

来终于有点“鸣”声，只是远远达不到“惊人”的程度。

军人和写作不仅从来不矛盾，而且很统一，军人应当具备的正直无畏的品格，这也正是杂文人应当具备的品格。不仅如此，军人写作还有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优势，那就是军旅的艰辛、环境的变迁、战争的残酷、牺牲的壮烈，总是重重地撞击着军人的灵魂，即使你知识不多也能吟诗为文，因为这些常常使你血脉贲张、激情万丈。像曹操、王维、王昌龄、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毛泽东、陈毅等，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认为是战争生活挤压和激发出的豪情和才智。军旅之人能作诗，当然也能写杂文，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黄宗羲的《原君》，当谓古代杂文之经典，只是那时尚未有“杂文”一词而不能冠以其名就是了。军人的正直、刚毅、无畏，为杂文写作奠定了性格基础和做足了精神准备。如果你听过有才情的军事指挥员在大敌当前之时的战争动员，那往往也是一篇极好的杂文。具体说来，我的杂文写作受三个因素影响：

一是家乡的桐城文化。桐城人重学崇文善辩。二是父母。父亲的叛逆精神和自信让我从小学会独立思考，母亲的善良忠厚使我知道要正直诚实。三是经历过战争。人生一经出生入死，就不会对什么感到畏惧。

杂文写作与个人身份其实本无关系，我曾经的许多军队领导，身居高位始终笔耕不辍。可有的人把杂文写作与身份联系起来，似乎位高权重者不宜写杂文，生存于体制内者不宜写杂文，办党报党刊最好不要登杂文。这些观点无疑缘于对杂文理解的偏差，他们觉得杂文是天生的坏坯子，有原罪，总是处在主旋律的对立面。这种看法是荒谬的。

我以为，杂文也是主旋律！

所谓主旋律，从其本意即音乐角度来讲就是多声部作品中的主声部。延伸到社会生活，就是在社会多种声音中，它是主调，最为动听的部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正义的声音。遗憾的是，现实中往往有人将主流意识与主旋律混为一谈，以为附和于主流意识的就是主旋律，与之相反的就是反主旋律。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理解。主旋律只捍卫真理、秉持正义，对于主流意识可以是颂扬，也可以是批判，关键要看主流意识是否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个社会的意识，并不是主流的就一定是好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接受和服从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族权与政权相结合

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可我们能说这个主流意识是好的吗？毫无疑问，它需要人们对其进行批判，而这种批判就是主旋律，反之对其顺从不是主旋律。我们许多人经历过的“文革”，其主流意识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早请示、晚汇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八亿人民，几乎人人被裹挟其中，常常喊出同一个声音。同样，我们能认为这个主流意识是好的吗？不然，它需要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这样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批判者的批判，这样的声音才是主旋律。

杂文是良心，杂文是胸臆，杂文是正义，所体现的主旋律可谓比任何文体都直接、都磊落、都鲜明。杂文不是主旋律的全部，但对于主旋律从来都是帮忙，而不是添乱。鲁迅“蘸血一样的墨”写杂文，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可谓没有比这更高亢的主旋律。当年中国处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人用杂文向统治阶级要人权、要民主、要自由，也可以说是高亢的主旋律。我们曾以杂文批判“四人帮”，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各种思想禁锢，推动改革开放，这仍然是高亢的主旋律。否定杂文是主旋律，就是否定鲁迅，就是否定自鲁迅以来各个时期杂文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一句话，说杂文不是主旋律，实是对杂文的无知；办报办刊去杂文化，则是对主旋律的扼杀。

一部作品，一篇文章，是不是主旋律，并不是看它是歌颂还是批评，而是看是否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于历史发展有无裨益。若是，就是主旋律，反之，再动听的颂歌也是悲曲。今天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读读当年为领袖所欣赏的某文豪的马屁诗，似乎无一句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甚至引领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可我们能说它是主旋律吗？

尽管我的职业要求与杂文写作存在一些反差，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冲突，当认同的必须认同，当针砭的必须针砭。一味盲目认同和一味盲目针砭，都不合乎科学精神。固执、偏见和傲慢，都容易偏离主旋律。

近十多年来，有不少热心读者关注我对苏联问题的研究，看到一些以此为体裁的系列杂文，觉得是我的一个特色。感谢这样的认可。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不是我要挑着苏联问题来写，而应该说是苏联问题缠着我来写。苏联问题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杂文素材库，苏联社会主义 74 年的历程，以及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影响，无疑是人类二十世纪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肩的大事件。如此之大的事件作为杂文人不关注，那显然就有些麻木了。它的意义不只是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而是关系到人类一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命运，关系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程影响的判断，当然也关系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问题。